

日语资料与中国研究

黄宗智

记得我自己青年时（上世纪 1963-1964 年间），为了写作关于梁启超的博士论文，曾去日本搜集相关资料，尤其是关乎梁在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到日本居住十多年期间的活动、写作与思想演变。当时，我投入了大量时间，几乎每天前往日本东京的“东洋文库”查阅、抄录、在被允许的范围内十分有限地复制其所收藏的资料，包括日本警察监视梁在日活动的报告等相关资料。

与那时的情况相比，如今的研究者们，由于原始资料的大量数字化，多可以一次性地简便复制数量大得多的资料，甚至仅通过远程（譬如，图书馆与图书馆之间的）联系，不必亲自前往便可能获得资料的复制件或缩微胶卷。这是如今的电脑化、轻易复制条件和国内外图书馆间的更紧密联系所带来的，五六十年前不具备的简便条件。个人即便必须亲自前往，也可能可以在短时期内获取、复制远超之前数量的资料。

固然，这些不可完全一概而言。有些特别罕见的资料仍然不可简单复制，起码不可大量复制。但是，相比上世纪六十年代时所必须面对的各种各样限制，资料获取情况已经大有改观。当时，除了亲自去实地搜集、抄录、有限复制之外，基本别无选择。仅在资料搜集方面，我之前（1963-64 年）须在日本待上一年时间来完成的工程，今天有可能数周之内便可解决。这样的变化直接影响到我们研究者所需投入的时间、精力和经费。

固然，当年我在日本呆上一整年时间的主要目的不仅是为了搜集资料，更是为了学习和实习日语。即使前者时间可以大规模压缩，后者也不可能短时间内完成。好好学习一种外语仍须大量时日，不可能一蹴而就。今天的研究人员固然能在更短时间内搜集到所需资料，但外语的扎实学习依然必须一定时间和时期的投入。那是无法高度压缩的工程。

但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曾经近乎必须的日语能力，今天一定程度上虽然重要，但除了研究日本占领、统治时期的中国地区之外，不一定还称得上“必须”。

日本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对中国的影响当然远远不及其前的半个世纪。日语对中国研究的关键性、重要性当然也一直在快速衰退。在二十一世纪的如今，日语对中国研究的

不可或缺性可以说基本仅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既包括日本的占领、统治地区时期的一手日语史料，也包含日本为了占领和统治中国所做的大量精准严谨调查和研究。

但总体来说，如今日语对中国研究的重要性实际上可以说已经从之前的笼统“不可或缺”下降到基本仅限于二十世纪上半期的研究了。除此之外，已经难说日语十分必要，或比英语更重要了。

如今的中国研究学者，除非聚焦二十世纪上半期，甚至不一定要学习日语。对民国时期的中国研究来说，日语确实可以说必要，因为它不仅涉及日本侵略、统治地区的原始日语资料，更涉及其所做的大量一手调查和所系统搜集的情报。其他时期的日语资料则主要仅限于二手学术研究。

对如今二十一世纪的外国的研究中国学者们来说，除非特别关注日据时期和/或地区，或者日语研究特别突出的一些有限主题（请参考拙作[《日语和中国近现代史研究》](#)，2025），实际上不一定还必须学习日语，可以基本仅依赖中文资料和文献。至为关键的因素当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完全自主，已经使所有外语资料，对研究中国来说，都仅处于价值有限得多的位置。

如今新一代的美国的对中国研究学者们，已经不一定要在汉语之外还学习日语，可以仅依赖汉语和英语来从事专业的中国研究。日语虽然重要，但已称不上“必须”了。对下一代的美国研究中国学者们来说，仅凭汉语和英语应该也能做出高水平的学术研究。